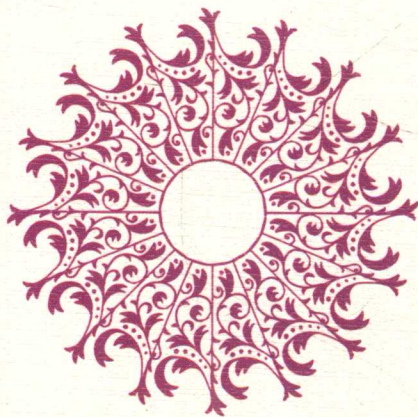


同济大学政治学丛书

后冷战时代的宗教文明与国家安全

HOU LENGZHAN SHIDAI DE ZONGJIAO WENMING YU GUOJIA ANQUAN

刘 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同济大学政治学丛书

后冷战时代的宗教文明与国家安全

HOU LENGZHAN SHIDAI DE ZONGJIAO WENMING YU GUOJIA ANQUAN

刘 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冷战时代的宗教文明与国家安全 / 刘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3
(同济大学政治学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9207 - 8

I. ①后… II. ①刘… III. ①宗教文化—关系—国家—
安全—研究—现代 IV. ①B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115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李 林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宗教向来就与国家安全有着不解之缘，这是由宗教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宗教或宗教信仰可能关系到国家或民族生存的核心价值观，与一般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相比更为持久，而且更缺乏弹性及不容忍妥协。宗教及其宗教组织一般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力、跨国联系、使世俗权威相对化以及使暴力合法化的特性，故宗教问题较易被国家视为安全问题或加以安全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宗教政治化、国际化以及暴力性宗教极端主义的肆虐，更是对国家主权和国际秩序提出了严重挑战，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业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难以回避的问题。

与国际关系相比，宗教其实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人们通常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至上的原则，从而一举奠定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不过细究起来，这一国际关系“还俗”的过程，远非一蹴而就，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才最终成型。庞大的天主教会，尽管开始走下国际关系的“神坛”，但始终是欧洲乃至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政教行为体，而且在欧美等一些地区和国家，在较长的时间里仍拥有“国教”身份，在所在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上，自然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更有甚者，宗教不仅具有组织性，而且呈弥散性，始终是人们日常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其实对使西方国家政治观察家和学者大惊失色的当代宗教基要主义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日用而不知”，因此宗教从来就具有超验和世俗的双重属性。而国家安全尽管被视为“具有高度世俗性”，但像领土和主权等国家安全要素已经被“把宗教拉下马”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并且像政治制度、主流

意识形态甚至领土等国家安全要素，也不是只有客观性而绝无主观性。因此，被渲染或建构为“具有高度神圣性或高度抽象的宗教”与“具有高度世俗性或高度具体的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并非天差地别，形同水火，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是隔着一层尚未被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捅破的窗户纸罢了。

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一样，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也是各种学科均可染指的研究领域。本人曾经指出，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可单指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而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则泛指国际关系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宗教与国家安全当然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学科路径来加以研究。不过国家安全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议题”，而非国际关系可与其他学科分享的“共议题”，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倚重可能要超过其他学科。

然而，要捅破隔开宗教与国家安全这层窗户纸，把对该议题的研究建立在学术而非对策研究的基础上，却并非易事。首先，宗教与国家安全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超验与世俗的冲突或张力。如前所述，宗教兼具圣俗两重性，并因此而产生了人文、神学和科学（或实证）三种研究路径。宗教“具有高度抽象性”的面向就与更具实证性的国家安全研究具有不兼容性。其次，缺乏权威数据库、跨国田野调查和民意测验是国内开展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瓶颈。其实在国外，有关数据库，如本书多处引用的“MAR (Minority at Risk) 数据库”，涉及的主要是国内和地区性宗教暴力冲突、少数派宗教群体和政教关系如所谓宗教限制及迫害等，主要反映了西方的人权理念和议程。此类统计数据缺乏客观性和权威性，而且需要加以引申和解读才能与国家安全对接。因此开展该领域的实证或量化研究，难度很大。第三，迄今为止的各种安全理论，包括所谓哥本哈根学派，实际上均未正面和系统地处理宗教问题，相关学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是隔膜，无法提供现存的分析框架，这当然也为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留有较大的空间。第四，无论在国际关系还是在国家安全中，宗教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中的因变量而非自变量，宗教是与政治、地域、民族、血缘、语言等因素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运动和事件中往往扮演着推波助澜的“催化剂”或“加速器”的角色，如人们很难将本书所提到

的波兰共产党政权解体和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归之于宗教。因此要在宗教与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之间建立因果链或“因果性影响”，也是极其艰巨的学术探索。

本书是国内学者较全面系统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宗教与国家安全，并试图破解上述难题，将宗教纳入国家安全研究，以及将宗教与国家安全议题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理论框架的一部最新专著。本书的国际关系理论辨识度、分析的完整性以及对宗教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参悟，在相当程度上均对此前的研究有所超越。本书作者从国家文化、威胁判断、意识形态和国际互动四个研究假设出发，通过妈祖崇拜、中国政教关系、“东突”恐怖组织以及宗教与中美关系四个案例，来阐述或从理论上确立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内在关系，并试图搭建一个宗教与国家安全互动的分析框架。如果要批评的话，那么作者此四个解开宗教与国家安全关联性奥秘的研究假设尚需完善，目前可能更基于国外而非本国实践，或更适用历史上政与教、教与教相互对立的西方，而不太适合政与教、教与教相对通融的东方。如在第一个研究假设中，尽管作者试图用“宗教文化”来稀释宗教或扩大宗教的外延，但我们很难说目前中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认知路线图”基于或源于宗教及宗教文化。此外，本书的研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宗教间冲突而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宗教冲突的外溢所造成的国内宗教问题的国际化和国家安全化，似乎并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内。

本书同样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是论证作为观念的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作者从观念因素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出发，通过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大分析模式，来阐述宗教对国家安全兼具因果和建构作用的“本体论”意义。作者认为，理性主义分析模式对国家安全有“路线图”、“黏合剂”和“制序化”的作用；而建构主义分析模式的各流派均支持“观念具有安全本体意义”的基本认识，通过“安全—身份—安全利益”、“观念—规范—安全决策”以及“观念—验与—安全关切”三种分析路径，来揭示观念与国家安全的互动关系。而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分析模式，对本书论证宗教对国家安全的能动作用和构建宗教与国家安全互动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基于国际关系理论或社会科学的依据。

本书把宗教界定为“一种认识，是一个由思想、规范和行为组成的观念体系”，从而强调了观念和思想作为宗教内核的作用，在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的“历史学进路”和“组织学进路”之外另

辟了“观念学进路”，这对于我们理解宗教观念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有一定的启发性。然而本书对宗教这种非传统的强调观念和思想的定义，不仅忽略了宗教“可能具有的神学、法学、哲学等方面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下调了宗教的社团性和“社会学属性”。宗教是观念系统，但不等于观念系统：宗教观念不同于一般观念，而更多是超验的观念；宗教不仅是神学、教义和观念系统，而且还是社会系统。如抽去超验性和社会性，哪怕是描述为“社会共有观念”，宗教恐怕就已不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宗教。如果在本书作者所建构的宗教与国家安全互动分析模式中我们用文化、意识形态或其他观念来取代宗教观念，该分析模式大概仍然是成立的。因此本书对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泛观念化”的处理，颇有些可斟酌之处。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除了理论研究外，宗教与国家安全尤其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在政策层面的运用或对策研究也具有日益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我国学者需要倾注学术责任感来加以关注的议题。近年来，本人在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的对策领域陆续提出如下观点：第一，有限安全化。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宗教国情下，我国在宗教领域似可采纳某种有限（选择性）安全化的对策，对宗教问题实行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并举、安全与统战并举，以及保持安全线与统战线、政策线与法制线相对平衡的政策。第二，国家安全研究无论在定性还是在对策上都要注重分级管控、区别对待。涉及宗教的个人、社会和国家安全三类安全问题尽管有所重叠，但在规模、范围、严重性、破坏性、国际影响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不能相提并论，因此需将个人和一般社会安全问题与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加以区隔，阻断个人和社会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按程度和性质就事论事地看待宗教问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使宗教政策更符合我国“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和“强国弱教”的宗教国情。第三，国家安全有积极、消极之分。消极安全具有被动和防御性，主要着眼于消除安全威胁和隐患；积极安全则具有主动和进取性，着眼于预防安全隐患以及扩大安全空间和手段。因此我国应更自信地开展宗教对外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在宗教对外关系领域实施积极安全政策，实现国内宗教政策与国家对外战略的对接，恢复和盘活散落在海外的我国宗教资产，把统战工作需要协调和处理好的宗教关系与海内外同胞关系放在一起抓，从而构筑中国海外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隐性防线。对策研究和建议是本书理论建

构的自然延伸，但显然还可有更创新的思路、更周全的分析和更可行的方案。

本书作者刘骞 2009 年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就职于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后工作站和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曾在国内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现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并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近 7 年的大幅修改和精心打磨而最后成书的。作为其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本人对刘骞博士所取得的成绩和本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在此祝愿刘骞博士在其专攻的国际政治安全理论、宗教与国际关系、美国政府和政治等学术研究领域，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徐以骅

2016 年 12 月 20 日于上海西郊寓所

序 二

宗教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学理上还是从现实上来看，将是一个长期的重大研究课题。只要国家存在，宗教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消失。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国家必然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举足轻重。一个国家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政策的适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这一国家的社会安全与稳定，甚至关系到国家的领土完整与分裂。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处理好宗教问题有利于国家与国际社会的长治久安。欧洲人移民美洲并在美洲开疆辟土最后安居下来，跟欧洲宗教改革中“清教徒”受到宗教迫害密切相关；俄罗斯与欧洲的长期不和跟东正教与天主教两大教派的分歧不无关系；中东地区的阿以冲突（巴以冲突）其根源在于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宗教文化冲突；伊朗和伊拉克曾长期的战争与冲突也是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所致；近几年因“伊斯兰国”引发的冲突也是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引起的。中国国内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也跟宗教有一定的关系。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觉察到了宗教与安全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主要由7-8种文明组成的世界，最终可能会出现伊斯兰教文明与儒教文明之间的联合共同反对基督教文明的情景。这种观点尽管缺乏学理研究的深入，甚至让人感觉有哗众取宠之嫌，然而他在文中率先提出的“文化研究范式”打破了权力研究范式和制度研究范式的传统框架，开辟了从宗教文化视角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先河，他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也引人深思，似乎国际安全冲突最终归根结底是宗教文化、文明间的冲突。

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宗教冲突和宗教性安全威胁，这是中国包容性的传统文化所致。如在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引发宗教冲突，而是佛教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中国还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广求佛像及佛经，并在中国形成了“汉传派”、“藏传派”和“南传派”三大佛教门派，佛教在中国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这是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跟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基督教在中国被认为是西方侵略世界的工具，基督教也被称作“洋教”。其实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受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没能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基督教没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宗教和迷信混杂在一起，在“破除迷信”的影响下，宗教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限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恢复宗教自由政策，各种宗教在中国获得较好发展，尤其是基督教的发展最为快捷，在中国城市、农村、大学都有基督教的影子，几乎随处可见基督教教堂。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在“金钱崇拜”“权力崇拜”“偶像崇拜”的影响下，人们的信仰、信念、道德观念出现迷失而寻求心灵的慰藉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数千年形成的宽容文化所致。在当下，中国真正受到宗教性安全威胁的是“东突伊斯兰极端主义”，如何化解这一安全问题是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

宗教与国家安全、中国安全、国际安全的关系如此密切，然而宗教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问题的关系在学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学理论证，国家安全研究中的宗教问题被忽视了。刘骞的《后冷战时期的宗教文明与国家安全》一书谨慎、尝试性地提出了宗教与国家安全关联性问题的分析框架，以图探索出宗教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真谛，文中的分析视角具有学术的创新价值。书中以中国的宗教问题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正处过于国家崛起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维护国家安全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胜湘

2017年1月1日于上海外国语大学6号楼701室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研究的意义	(5)
第二节 问题的研究现状	(13)
一 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与理论成果	(14)
二 中国学者关于本问题的研究	(25)
三 对以往研究的评析	(28)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假设、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	(33)
一 本书的研究起点与研究假设	(33)
二 本书的主要观点及其结构安排	(35)
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	(36)
第一章 后冷战时期宗教的国际政治学意义及其研究界定	(40)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全球复兴	(41)
一 宗教全球复兴的概念及其内涵	(42)
二 宗教全球复兴的国际政治学意义	(45)
三 宗教全球复兴时代下的宗教与国家安全	(48)
第二节 宗教的国际政治学界定	(53)
一 宗教是一种观念体系的分析认定	(53)
二 宗教观念体系对于国家安全的含义	(60)
本章小结	(66)

第二章 宗教与国家安全的互动分析	(68)
第一节 观念与国家安全互动的理论模式	(69)
一 理性主义分析模式	(69)
二 建构主义分析模式	(75)
第二节 两种理论分析模式的启示	(82)
一 理性主义分析模式的启示	(82)
二 建构主义分析模式的启示	(85)
三 小结	(90)
第三节 宗教与国家安全的互动分析框架	(91)
一 国家安全及其概念界定	(91)
二 国家安全分析的判定依据与判定环境	(94)
三 宗教与国家安全互动关系分析框架	(98)
本章小结	(102)
第三章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104)
第一节 中国的传统宗教文化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基本主张	(105)
一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界定及其内涵	(105)
二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安全观	(108)
第二节 中国新安全观与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关联	(113)
一 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与发展	(113)
二 中国新安全观的内涵及其宗教文化因素	(118)
三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安全观在中国新安全观中的体现	(124)
第三节 个案研究:传统妈祖信仰与两岸关系(1987—2001)	(127)
一 妈祖信仰及其对于两岸的意义	(128)
二 两岸交流中妈祖信仰团体的活动轨迹	(129)
三 妈祖信仰在两岸关系中的影响分析	(132)
本章小结	(135)
第四章 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宗教观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137)
第一节 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宗教观	(138)
一 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	(138)

二 中国关于宗教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基本观点	(141)
第二节 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宗教观的历史考察	(144)
一 冷战结束前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宗教观的发展轨迹	(145)
二 冷战结束后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宗教观的新发展	(149)
第三节 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宗教观发展轨迹的分析	(154)
一 观念的“聚焦”与“黏合剂”作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155)
二 观念的“制序化”作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161)
本章小节	(164)
第五章 宗教性安全威胁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166)
第一节 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及其影响因素的判定	(167)
一 国家安全利益的判断	(167)
二 国家安全利益的构成与分类	(170)
三 冷战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172)
第二节 宗教性安全威胁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175)
一 宗教性安全威胁及其内涵	(176)
二 中国对当前宗教性安全威胁的认知与判断	(181)
第三节 个案研究：“东突”伊斯兰主义与中国西部安全	(186)
一 “东突”伊斯兰主义及其内涵	(187)
二 “东突”伊斯兰主义蜕变和异化的轨迹	(189)
三 基于“东突”伊斯兰主义蜕变异化轨迹的分析	(196)
本章小结	(202)
第六章 宗教问题安全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204)
第一节 安全研究的“安全化”视角及其逻辑	(205)
一 “安全化”分析视角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206)
二 安全化逻辑及其对于“安全化”的意义	(209)
第二节 宗教问题安全化及其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意义	(212)
一 宗教问题安全化的提出及其过程分析	(213)
二 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后果分析	(217)
三 宗教问题安全化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意义	(220)
第三节 个案研究：冷战后美国安全化宗教问题对中国的	

影响(1991—2008)	(223)
一 冷战后美国对宗教问题安全化的推动及其进程	(223)
二 冷战后美国安全化宗教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230)
三 小结	(241)
本章小节	(242)
结论	(244)
一 内容综述与研究结论	(244)
二 理论启示:对国家宗教安全研究的理论思考	(247)
三 现实启示:对中国宗教安全问题的对策思考	(250)
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80)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2001年9月11日,北京时间的20点40分,一批怀着宗教信仰的恐怖分子劫持了数架飞机分别冲向了美国的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随后,这次事件引发了世界的“震动”,也为各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国际政治学)^①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政治学者研究国际关系时需要有一个核心的问题,而核心问题的选取需要对某一国际关系实践首先做出“它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发生”和“它发生后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式描述,然后再从中提炼出核心的问题。^②这意味着问题的呈现和分析需要基于对“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回答。

为此,从对国际政治学发展历史的回顾,本书注意到国际政治的研究一直与国家安全研究紧密相关:作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渊源的修昔底

^① 有研究指出,冷战在终结两极为特征的国际秩序之后,世界秩序进入多变和重构的过渡阶段,而“9·11”事件揭示了世界秩序“不对称化”时代的到来,这也开启了被称之为“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新时代。James Der Derian, “Imaging Terror: Logos, Pathos and Ethos”, in Barry Buzan and Lene Hasen, 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IV: Debating Security and Strategy and the Impact of 9.11*,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p. 341 - 342.

^②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德学说就与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思考密不可分；作为近代国际关系起源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与主权国家学说则与欧洲三十年战争休戚相关；1919年5月，国际政治学科的正式诞生，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分不开；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研究，国际政治学建立了主流“新-新理论”（neo-neo synthesis）的国家安全观。可见，国家安全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也正是本书试图探索的最核心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家安全成为本书立论的中心，也成为本书对“9·11”事件进行理解和思考的切入点。对于“9·11”事件，各国学术界已有许多的分析和思考，这些分析基于不同的视角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可，“9·11”事件过程中的“袭击”不是由某个具体的敌对国家发动的，而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以个体组合为形式的群体行为。这些人没有使用大规模的武力，却同样给民众生命和国家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灾难性的后果堪比一场战争的破坏。这次事件给受攻击国（美国）民众的心理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引人注意的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美国即便是拥有着无可匹敌的最强大军事力量也难以保障国家的安全。^①

显然，“9·11”事件的发生令那些持主流国际关系观点的学者们困惑不已。一直以来，主流理论分析框架坚持理性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他们确立了国际关系单纯的物质主义本体论，构建了一个以军事力量定义的国家权力观和以物质收益为主的国家利益观，并且，他们声称国际关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必须坚持实证主义的规范而不是诠释性的原则。然而，“9·11”事件的发生打破了他们引以为骄傲的“国际政治理论”，引起了他们的反复思考和争论：^②为什么这一事件会发生？为什么没有敌对国家？为什么没有使用大规模的武器就可以造成灾难性的战争损害？为什么武力强大的美国无法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本书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引发这些疑惑的不是“9·11”事件本身，而是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架构所束缚的思想。^③而我们必须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做出思考。

① [法] 吉尔·安德雷阿尼、皮埃尔·哈斯内主编：《为战争辩护——从人道主义到反恐战争》，齐建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27页。

②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7.

③ David Brooks, "Kicking the Secularist Habit",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2003.

在本书看来，“9·11”事件是一个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无法解释的事件。虽然不能说主流理论“一无是处”，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主流理论的核心假设已经难以满足后冷战世界的现实需求，因此，我们需要关注被主流理论所忽视的东西。

那被忽视的又是什么呢？这就需要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上进行反思。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都接受物质主义理论，不承认观念的实质性意义。新现实主义的最基本概念——国际体系结构——指的是国家物质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配状态，其核心概念塑造的以军事力量为主要内涵的国家权力和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国家收益也反映出物质主义的浓厚色彩。以新现实主义批评者姿态出现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了反对现实主义物质至上的论调，提出了一个新的核心概念——“制度”，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质的，但是，其强调的重点在于制度能够提供“多少”物质回报，其本质仍是以物质权力和利益作为国家行为的主要动因。对于新现实主义来说，观念是无足轻重的；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来说，观念能够成为一个与权力和利益并列的自变量，具有独立的因果作用。然而，对经济学过多的借鉴使得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论证中不断偏向于分析如何通过国际机制克服政治性市场失灵（political market failure），而将观念置于物质权力和利益的从属地位。^① 所以，本书认为，国家安全研究需要注入的新元素就是那些为主流理论忽视的观念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元素，即国际政治文化。然而，国际政治文化是一个纷繁复杂又无所不包的多元范畴，包含着诸如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国民心理、宗教文明和民族特性等诸多层次的内容。^② 如何选择一个更符合后冷战时代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作为切入点，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成为本书面临的又一个关键问题。

让我们回到“9·11”事件发动者对发动这场袭击的表述上寻找一下答案。2004年10月29日晚，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对美国民众发表讲话的录像带。在所播出的七分钟录像中，本·拉登首次承认是他下令发动了“9·11”对美袭击事件，阐述了

^① 刘骞：《国际安全研究呼唤宗教视角》，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四辑，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00页。

^② 潘一禾教授在《文化与国际关系》书中对此进行了归纳和探讨。参见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